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研究

周启杰^{*}

【摘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治国理政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基础之上的。国家观是马克思历史观中的重要内容。对国家问题的研究和批判,不仅是实现其哲学观变革的必要步骤和确立实践唯物主义原则的必备环节,也是马克思成就自己的社会学思想和政治学理论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早期对黑格尔国家观和法哲学的批判只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哲学立场,并为后续的社会批判寻求到可靠的哲学基地,那么,马克思在1845年之后的研究则展现出了他明显的政治目的和诉求。只有通过对马克思国家观的哲学基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国家的本质及国家消亡的过渡性分析,才能揭示出马克思关于国家问题的核心思想,从而展现出对现代国家治理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家治理;所有制;阶级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既牢牢继承经典理论原则,系统总结概括实践经验,又科学判断时代特点和历史方位,把握新实践进程中出现的新特征,逐步孕育形成具有内在完整逻辑结构和内涵丰富的科学体系。”^①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系统地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治国理政的系统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这一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基础之上的。哲学观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是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正是以哲学批判为前提,马克思才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社会批判。要清晰地把握

^{*} 哲学博士,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150030。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考辨及影响研究”(17YJA71004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阶段性成果。

^① 尚庆飞:《“新的历史特点论”:党中央治国理政科学体系的历史基座》,《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握马克思国家观的实质,首先必须明确国家观的哲学基础,然后厘清国家的起源和历史演进,从国家的发展趋势中,彰显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国家观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问,反思哲学的基础必然是实践活动中的现实化生活世界。这一哲学观念不仅彻底改变了传统哲学的对象、性质与功能,也彻底改变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在1843年9月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批判传统哲学错误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但无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概念(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还是家庭、市民社会决定法和国家的思想,都已在5本《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得到了历史的求证。该书中,马克思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和有关国家与法的政治学著作,研究了横跨欧美主要国家纵观两千年的历史资料,包括施密特的《法国史》和达律的《威尼斯共和史》,阐明了封建所有制的产生、各种形式同政治的关系及对整个社会制度和国家的影响,封建社会结构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代议制与私有财产的关系,为后来马克思研究分工、所有制、阶级与阶级特权、国家与法的发展奠定历史基础。因此,马克思决定以费尔巴哈“颠倒的方法”,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思想,认为黑格尔以“主词”和“宾词”错位的方式颠倒了它们的关系,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因而,作为绝对精神显现的理性国家不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目的,相反,只有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和社会活动的原动力。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就是私有财产是决定政治国家的基础,它代表的利益不过是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体现。要变革旧的国家制度,就必须经过真正的社会革命。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以及在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认为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世俗世界的分裂,宗教解放不是世俗狭隘性原因而是它的表现,人们的政治异化决定人们的宗教异化,要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政治、国家和法的批判。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和神学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世俗问题和政治问题,宗教存在缺陷的根源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因此,只能用公民世俗的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和政治异化,才能克服宗教的狭隘性。“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①把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作为哲学批判的主要任务,也只是解决了政治异化和政治解放的问题,市民社会的异化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社会革命的政治解放还有局限性,只有市民社会的解放才是人类的全面和彻底解放,这一问题只有到经济学领域去寻找了。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和条件只能诉诸人本主义、无产阶级和武器的批判,其根本途径就是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是头脑而无产阶级是心脏,只有哲学成为了现实,无产阶级才能消除自身和一切阶级。在研究了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剖析,通过解剖人与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和他人关系的异化,解决了马克思的两大疑问和困惑:一方面,是市民社会与财产关系的异化问题;另一方面,劳动异化是世俗世界分裂和社会各领域全面对抗的根本。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自由自觉地劳动才是人的真正本质,劳动中的对象性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对象化,便构建了以人为主体的现实生活世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界或自觉的文化世界。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不仅以实践的观点说明宗教、自然、认识 and 人的本质,也以实践的观点来说明社会、国家和历史。至此,马克思才找到了作为现实人的思维(超越了康德、费希特和青年黑格尔派)与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存在(超越费尔巴哈)相统一的真正立足点,那就是生产劳动和实践。而实践衍生的生活世界则确立了一种“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哲学观成熟后,马克思正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来阐明劳动、分工以及交往关系、社会组织和国家等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再一次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包括老年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甚至包括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在内,都把宗教的解放看成是人的全部问题,对宗教的批判,其出发点仍然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然后把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和其他形式的观念也被归入宗教和神学观念,宗教被当成了前提。不同的是老年黑格尔派把宗教、概念和普遍的东西对现存世界的统治看成是合法的加以赞扬,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尽管费尔巴哈向前迈进了几步,但“类”“唯一者”和“人”也没有超出黑格尔哲学神秘主义的特色。这是用一种解释代替另一种解释和用一种词句来反对另一种“词句”的做法。不同于思想领域的革命,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则以一种新的前提予以批判之,这些前提是可以经验的方法加以确认的,那就是现实人的活动和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正是在这一哲学前提的基础上,以科学经验的方法阐明了社会历史的发端、结构与整个发展过程,国家作为社会机体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得到合理的解释。马克思认为,创造历史的有生命的个人,首先要满足自己的物质资料的需求,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就是物质生活本身,新的需要的产生和再满足就是一个历史活动。同时,这一过程也是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是一致的,这种物质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使生产决定着个人之间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部门的经营方式,便产生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因此,一切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为基础,最初是家庭关系,后来随需求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多,社会关系便复杂化了。意识因素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语言和意识作为“关系”的存在,一开始就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由需要的生产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就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与一定的社会阶段相联系,其总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状况,所以,需要和再需要的生产、社会交往关系和意识等诸要素,不是历史的不同阶段,而是从历史初期起就同时存在并始终起作用的,使家庭和国家成为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护者。纵观以往的人类史,所有的社会矛盾都是在国家意志和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矛盾的基点则来源于劳动和分工的发展,自然分工产生了人的不同职业,社会分工则产生了所有制形式和特权阶级,为保护所有制与社会关系的秩序化以及特权阶级的利益,国家就自然产生了。

二、氏族国家、民族国家与市民国家

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国家向来就被称之为“共同体”的东西,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家庭不过是国家共同体的萌芽形式。国家虽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志体现,但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的本质和职能的表现形式还是有所不同,按其类型可以分别称为氏族部落国家、民族国家和市民国家以及未来的联合占有的“自由人联合体”国家。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是由生产的水平和分工造成的所有制的特点所决定。所有制是所有社会财富关系的制度化,在马克思的理论当中有狭义和广义的使用含义。狭义上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和支配权以及使用权,它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广义上指以人权所有为核心相应的非物质资源的所有关系,包括人的各种生存权力和权益的保障,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总之,所有制体现了人们的社会交往关系,这种制度化交往又分为人权方面的所有关系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在这种

双重所有关系的前提下,马克思按历史的先后发展顺序,分别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称为部落共同体所有制、古代公社或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生活和国家。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中,根据40年前摩尔根《古代社会》对北美地区印第安人古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并对比欧洲蒙昧、野蛮和文明的历史,再一次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所得出结论的全部积极意义。一方面,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种的繁衍,相应的整个社会生活受两种生产的制约,分别表现为劳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原始社会主要以家庭为主,家长制是所有制的萌芽形式,先后经历了母系制和父系制两个阶段,无论是血缘家庭、普纳路亚家庭、对偶家庭还是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偶然的血缘关系纽带和宗教观念的现实性表达,加之劳动分工的影响,家长被赋予成神的后裔和代表,他有人权隶属关系(包括婚姻关系)的决定权和财产的分配权,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就是唯一的社会关系,类似于政治和法律(私法)的规则,看似对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平等的,但它实质上代表了家长个人意志的私人性,所以,私有制在家庭内部已经起源。

氏族部落所有制是家庭所有制的延伸和发展,所对应的国家形式是氏族部落国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共同体的方式出现的国家形式。马克思之所以把它称之为国家所有制,是因为作为极少数奴隶主贵族的氏族首领就是国家的象征,氏族部落内的所有人力资源和财产统归属于代表国家的贵族所有,氏族部落及其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无条件地服从神和自然赋予的最高权力,罗马国家统治的巅峰就是典型。在这种国家制度中,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融为一体,国家政权和整个社会生活并未分化,人权所有的“政治关系”决定所有的社会关系,即在国家内部,人身权力上的所有制和隶属关系更为根本和起支配地位,它直接决定着生产资料的占有和财产的分配以及生产活动中的地位。这是因为被统治者不是作为独立的人格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财产隶属于统治者,所以无法要求自己的财产权,物质资料的需求完全取决于贵族的喜好给予的多寡,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要交付于他人来掌管,鉴于此陪葬的社会习俗(国家制度)便不那么难于理解了,事实上,“劳动愈不发达,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①随着生产资料逐渐转归社会所有,家庭已不是社会的独立经济单位,阶级的产生、对立和冲突主要取决于人权所有关系的内容为依托,国家的基层单位也开始从血缘团体向地区团体转变,所不同的是仍然以血缘为主体的氏族关系比家庭更为复杂化了。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曾将人的发展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三个阶段,氏族部落国家完全代表了“人的依赖关系”的古代公社所有制形式。人对物的需求完全取决于人的依赖关系,人的依赖关系就是人权的隶属关系,它在所有制的范围内往往被人所忽视。随着氏族部落之间的竞争,必然会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这种国家组织注定走向灭亡,后来部落联盟的出现,已经意味着这种组织开始走向崩溃。

封建等级所有制所对应的国家,是一种地区部落或城邦部落形式,也被称之为民族国家。随着分工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尤其是土地被分割成了私有财产,后来又出现了一定的动产,这种情形与“野蛮”时代后期发达的产品交易相符合。由于战争和迁徙,各个氏族、胞族和部落成员的杂居,打破了氏族制度机关内部的正常活动,英雄时代的议会制、人民大会制和酋长制的改变,在于需要设立一个中央机关来管理以前独立部落的一部分共同事物,于是氏族部落及联盟融合为统一的民族,氏族制度的机关转变成国家机关,私法转变成民族法,使非本部落地区的公民也取得确定的权利和新法(含财产规定)的保护。这样,使原来家庭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转变成了由一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些拥有财富和权力的家庭联合便产生了独特的特权阶级或“王室”。为了维护“公共”的特权,武装起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

来的国家机关成为必要,区别于传统的族民自卫军,武装人员一般由王室家奴的专门“骑士”组成,这便使国家与氏族社会的矛盾演变成特权者与非特权者之间的矛盾,非特权者因为职业分工的不同分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农民分有的土地有限,还必须把所有权交给保护人或作为佃户以力役或代役的方式租种他人土地,按新的习惯法的高利息规定,土地收入不能还债,债务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人身权出卖为农奴。中世纪的行会市民,为保护其特权的各种行会规约或在法律上的种种人为限制,已经不是完全出自于某些个人的意愿,而开始受城邦部落的利益关系所驱使,商品与货币的产生和财富的积累,打破了农村公社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生活方式。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以国家共同的方式占有的财产份量时,人权所属关系的地位被减弱,国家制度的缔结开始向依赖于经济因素上的考虑为转移了。在国家制度内部,财产所有关系和人权所有关系在社会体系中占有同等重要地位,两种形式的所有制统一地决定着阶级的冲突和对抗。所有制和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与国家政权相分离,因为等级制使各个等级中的个人,无论在人格个性还是财产关系上,都半隶属于自己所有,虽然各等级占有的程度有所不同,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例如劳工役)有时按财产的多寡来规定。随着氏族人与外来人的融合,亲属性质的关系让位给地区性质的关系,国家的基层单位就更加地区化了。虽然物质财产关系还没有取得社会生活的统治地位,且所有制还残存着氏族制度的国家性,但这种政教合一的宗法制已经使极度依赖于人的“野蛮”向独立个性的“文明”过渡一大步。

资本主义所有制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也被称之为市民国家。随着分工慢慢侵入生产的整个过程,它破坏了生产和占有的国家共同性,使各个人的占有成为占优势的原则,个人之间的交换,使商品经济逐渐成为了统治的形式,尤其是货币的出现便产生了相对独立的商人阶层,商人的中间插入,使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更加错综复杂化,似乎任凭纯粹的偶然性摆布。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就是必然性,它愈是受偶然性支配,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的必然性在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受盲目的自发规律的调节,社会劳动的竞争就发生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大分裂,进而在原有男女差别的基础上产生了城乡和脑体之间的社会对抗。雇佣劳动制就是一种隐蔽的奴役制,不过是以纯粹的私有财产和赤裸裸金钱关系为基础,马克思称之为国家共同体与所有制完全分离的“纯粹的私有制”。^①因为,近现代工业和世界贸易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状况,就为财产关系影响社会关系和制度缔结打开了决定性突破口,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并成为阶级对抗的主要内容。产品的交换逐渐取代了遗传下来一切古老的人际依附关系,以买卖、“契约”代替了世代相袭的习俗和历史的法规,这不过是以一种形式的所有制来反抗另一种形式所有制的革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所有权而进行的。大工业的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抛弃了国家共同体占有形式的一切外观,使国家与所有制决定的“市民社会”生活已经分离,并成为社会交往制度化的真正表现形式。契约使“自由”而“平等”的人们,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的行动和财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任务之一;所确立的人的意志自由原则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反抗任何强迫他人行为的做法,乃是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但由于财产权归统治阶级所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权上的自由、平等的独立个性,实践上实际只限于资产阶级内部,而对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来说,则直接或间接地化为乌有,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契约的缔结只不过是一种“博爱”形式的伪善,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民国家完全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单个人的私人财富而不是社会财富成了“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以物的方式进行的统治已成为异化和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科学的繁荣和艺术的成就不过是这种文明的伴随品。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每个人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等级差别特别显著地体现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1页。

级的对立中。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使社会发展始终处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矛盾不解决,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异化就不能被扬弃。因此,市民国家中人权归各个人所有,在政治和法律上是自由平等的独立个性,在国家的本质上反映的却是一种经济关系,不外是有产者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这正是现代国家的一种特点。

三、国家的本质、趋势与现代治理

当然,国家的类型与几种社会形态不能僵化教条地划等号,例如受约于某些民族的特定历史状况,氏族国家在蒙昧时代的中高级阶段就产生和发展了,同样,民族国家也可能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就已经萌芽。根据国家的历史演进,特别是针对现代国家的表现形态,马克思对国家的本质进行了基本规定。国家本质上是所有制的政治表现形式,是人权关系和财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以前各阶级的革命,总是把旧有政权的争得视为自己胜利的战利品,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在新的国家政权的保护下,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旧的国家制度中萌芽和产生。在此基础上,列宁把国家称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

依据国家的历史演进和本质,马克思得出了国家消亡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超越国家论”。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只有随生产的发展,消灭了社会分工产生的所有制和阶级,使国家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性转变,并成为“自由人联合体”形式,才能实现第三阶段的人的“自由个性”。真正社会主义所有制不是国家占有制形式的“公有制”,而是联合占有的形式。国家占有是以少数人占有的私有化,而“市民社会”的所有制是多数人的个人私人占有形式,联合占有则是对任何私人占有形式的发展和超越。因此,作为这些社会生存条件的维护者,就是社会上各个人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形式的国家,无产阶级只有推翻国家才能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当然,联合占有并不是排除任何形式的个人所有,生产资料中类似工具类的财产和基本生活必需品仍具私人性,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重建“个体所有制”的初步想法。正像人的自由个性是对依赖性和独立性的超越一样,自由联合既改变了人们交往关系的依附性,又在保留个性的基础上打破了人际关系的封闭状态,相应的物质资料 and 消费资料极大丰富,就像原始的自然资源那样,是无所有权划分的联合占有形式,这才是马克思所说公有制的真正内涵。

但国家的未来发展和消亡要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决定于生产和分工的水平,与人类的生产能力和整个的社会生活状况相适应,现阶段要想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首先要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因为分工包含了所有的社会矛盾,起初是以家庭为基础,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成为所有制的萌芽和最初形式,所有制是分工的必然结果。由于国家始终是在所有家庭集团和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利益联系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分工所决定的阶级基础上产生的,这种阶级统治的性质,使国家范围内的一切斗争,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形式,即“普遍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下,进行着不同阶级间的真正斗争,“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取得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①。“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②。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型”和“消亡型”国家政权,是变革全部旧的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手段。这些思想不过是早期思想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85、293页。

的一贯延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指出,无产阶级不消灭自身,哲学家不能现实化和世界化。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了无产阶级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唯物主义者的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描述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时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1852年马克思就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表明“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又批判了以巴古宁和拉萨尔为代表的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国家观,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歪曲为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国家主义。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正如列宁所说,现阶段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③。

马克思的国家观,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以下三点重大启示:第一,作为共产主义的过渡期,现阶段国家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国家是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是阶级社会中特殊的公共权力,与原始社会的公共权力比较,其特殊性表现在: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公共权力组织,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按区域划分而组织起来的暴力机器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工具及管理组织,阶级性是国家体制的灵魂。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现阶段面临的历史条件极其复杂,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社会分工还比较严重,阶级和阶层的划分还没有消除,特别是民族和国家间的冲突还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是现阶段历史赋予无产阶级“过渡型”或“消亡型”国家政权的使命。国家的运转是通过政治体制中的政府职能来实现,政府的阶级性有赖于建立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本质上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活动是按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进行政治统治和管理,阶级性的主导作用贯穿在机构构成、制度设置、政策制定、价值倡导和各种实际活动中,统治阶级的性格构成了政府的基本性格。虽然国家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形式,但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实现其统治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往往不得不以形式上的中立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面貌出现,政府就是实现这种表面上公共性的基本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是初级阶段,但国家也应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政权内部的这个范围,政府也必须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实现者,而运用政府的权利谋求特定社会集团或者私人利益,是与政府的这一特征相违背的。所以,政府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政府的作用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在形式上或本质上把自己的主张、制度、规则和政策上升为对普遍公共的利益诉求,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或实际要求来行使权力。第二,坚持国家政治职能向管理职能的转变。要消除国家机关的统治性质,首先需要消除国家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活基础,这个基础表现为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两大方面。一方面,组织社会生产,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其达到足以消灭社会分工的水准。否则,社会就只有普遍的贫穷和极端的贫困化,人类又会陷入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分工造成生产活动的固定化,将人限定在强加于他的特殊的活动范围内,这种统治我们的物质力量,将会成为不可控制和驾驭的异己的对抗力量。另一方面,建构社会各领域合理的交往关系,以政治和法律手段配合各种协调机制,使整个社会生活全面走向秩序化。否则,生产异化作为不堪忍受的破坏力量,又会产生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与有钱和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重新引起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都没有真正威胁到旧的交往形式的基础,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劳动的异化性质,不过是按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间重新分配劳动。社会主义革命则针对的是劳动迄今具有的阶级和国家统治的性质和形式,要求消灭阶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4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统治和阶级本身,完成革命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上已不算或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一切阶级和民族的解体表现。所以,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在革命成功后,应从政治职能向管理型职能转变。第三,坚持国家的区域性向世界性转变。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甚至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但社会主义目标的最终实现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才能完成。因为,只要分工和阶级存在,国家就不可能消亡,真正的自由人联合只能是一个理想。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的普遍交往,才能使世界各民族的变革相互依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随着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积极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各民族原始的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分工的消灭,历史也就愈发成为世界历史。虽然社会的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还为时尚早,但受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贸易的扩大和交往的世界性的影响,尽管有时仍会出现地区性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但全球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国家也会从区域性而走向世界性。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历史,但不会完成,只有无产阶级和它的事业作为世界历史意义的存在才有可能。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世界的历史责任。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职能的上述转变,加强党的领导和从严治党是关键。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①所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的最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

(责任编辑:杨嵘均)

Marx's Thought o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A Stud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cerning the Governance of a Country

ZHOU Qi-jie

Abstract: The theor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based on the Marxist outlook on the state, which is the major component of Marx's view on history. The research and criticism on the issue of the state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step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 philosophical outlook and the essential link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pract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constitutes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sociolog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theory. If Marx's criticism of Hegel's outlook on the state and philosophy of right in his early years can be regarded as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his own philosophical position and build a secur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for his later sociological critiques, then his research after 1845 displays clear political purposes and pursuits. Only through analyzing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Marx's outlook on the state and his theory o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essence and death of the state can we reveal his core thought on the issue of the state and then bring to light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governance of a modern country.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national governance; ownership; class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61页。